

“文化流动”的新文化史学阐释

周笑冰 王炎麒

摘要：“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孤岛。文化孤岛的时代早已逝去。”文化流动的特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表现的更为显著，全球化趋势代表着接触、碰撞、互动、交流和杂交的过程，若忽略这一过程来研究文化现象，就失去了理论与当下现实的必要连结，也就失去了对当下现实的解释效力。以彼得·伯克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正是意识到流动性之于文化的重要意义，将注意力转向文化杂交的复杂过程，试图通过分析这些现象，观察到文化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结果。

关键词：文化流动；新文化史学；全球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2) 03-0100-06

一、文化研究转向

全球化改变着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基础。正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1]全球化加速了文化的流动，这使文化在全球化的加持下呈现出更多不同于此前时代的新特征，这也极大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现代意义上“文化”一词的兴起是与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文化”被全球化卷入更复杂的情境之中，“在现代，时一空延伸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就此而论，全球化本质上是指这个延伸过程”。^[2]在全球化延伸过程中，学界对文化的研

究的对象、方法以及对文化研究的态度也在不断地变化。

人类学家较早介入文化领域的研究，当时人类学家所处的时代正值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蓬勃发展，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率先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极速加快了欧洲向世界扩张的脚步。将“文化”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正是源于欧洲人的对外扩张，这让欧洲学者更多地看到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存在，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素材。最早从科学意义上为文化下定义的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 Tylor），“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3]在研究对象上，以人的问题为核心，将人看作是文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早期文化人类学倾向采取

比较性研究的方式,一方面从内部向外看,立足自身文化看其他文化,另一方面从外部向内看,从其他文化观察自身文化,通过比较研究区分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试图描述文化和文化系统发展过程一般规定性。自“文化”一词进入研究者视野,它的内涵就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最初,它被指代上层文化,即精英文化;后来大众文化的发现,它又向下引申;近些年,文化的内涵又横向扩展,如科学、艺术、音乐、人工制品以及实践活动。自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形成了进化论、功能论、结构论、心理学派、生态学派、历史学派等诸多流派。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历史学家开始借用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形成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化发生兴趣的不只是历史学,这一时期,在各门学科中,都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向”,例如经济学家发现理性消费的简单模型不能对消费趋势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将目光转向文化,企图从中有所发现。再如“文化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原本专攻政治学领域,他在研究了军事政策及战略、美国政治和政治比较、政治发展和政治秩序以及民主化等问题后,他将研究重点锁定了文化领域,他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不再重要,人们需要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他却敏感地意识到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同时,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

在这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中,“新文化史学”研究算是一股强劲而活跃的力量,它最新的特点是将许多新主题容纳到“文化”内,并试图将其系统化。例如一些出版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就出现音乐文化史、视觉文化史、政治文化史、民族主义文化史、移民文化史、消费文化史、语言文化史、企业文化史等等。“新文化史学”企图跳出“本质主义”的带有绝对化与僵化倾向的思维定式,解决以往文化研究与人们日常经验渐行渐远的问题。^[4]“新文化史学”更强调个人是历史的主体,就长时段历史而言,每一个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有可能影响历史趋势。

“新文化史学”这一流派的出现应追溯至

20世纪70年代中期,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是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任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在欧洲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建树颇多,著有《过去的复兴意识》(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196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972)、《近代早期欧洲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78)、《社会学与历史学》(Sociology and History, 1980)、《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1987)、《史学与社会理论》(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1992)、《塑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1992)、《文化史的变异》(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1997)、《什么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e History, 2008)、《文化杂交》(Culture Hybridity, 2009)等著作。

自20世纪70年代,悄然兴起一场新文化史运动,在新文化史学运动的旗手彼得·伯克看来,这场运动虽然不是自发的,但也绝不是单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一场集体运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研究者都有参与其中。这些研究者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新的研究主题,将历史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符号、心态、观念等与文化相关的一切领域都纳入到史学研究范围,如物质文化研究、身体研究、记忆与语言研究、形象历史研究、政治文化史研究;二是新的研究方法,即将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研究取径结合起来,既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又结合学科外部的观点,如与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发生的“文化转向”联系起来,从注重不变的理性维度转向注重文化的价值维度。

二、文化流动的几种情况

何谓“流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 2000)一书中对流动性做了很好的解释。流动性原本是液体和气体的特性。相对于固体而言,当流体遭遇固体障碍时,可以绕过、或溶解、或浸透障碍,流动与多变总是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用“流动性”来类比“现在”这个历史阶

段所表现出的新奇的时代特征最为恰当。因为“流动”改变人类的状况，旧有的结构、格局、依附和互动模式被打破，“流动”也生成着重新铸造和塑形的力量。^[5]

有学者认为，文化流动是单向的、定向的、客观的，并总结出文化流动的三个规律：高文化向低文化流动；文化中不同成分流动的不同步性；文化流动的整体性。^[6]这三个规律很容易找到相应的例证：第一条规律可以举证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欧洲各国纷纷学习效仿的对象。第二条规律指文化中包含着物质技术、组织制度、思想观念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文化流动的速度各不相同，一般来说，物质技术的流动速度要高于组织制度，组织制度要高于思想观念。例如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相遇的过程基本与此相一致。第三条规律指当高文化的某种成分流入低文化系统后，其他成分也会陆续进入低文化系统，因文化流动的不同步性造成的暂时性分割的文化状态，最终也将重新组合成完整的文化形态。例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

对文化流动规律的总结的确可以帮我们勾勒出一张清晰的文化流动图景，但当我们注意到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时，上述结论可能会不可避免地遮盖了文化流动过程中发生的复杂的、捉摸不定的交互、混杂、杂交等情况。19世纪以来对文化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放在观念或思想体系的层面上考察，尽管这种研究更规范、严肃和准确，但很容易忽略人作为文化主体的重要作用，人的心态、情感、价值观比较含糊，也难以做出一般规定性的叙述，却更有想象力，新文化史关注的恰恰是这一方面的缺失。这并不代表新文化史不关注理论，恰恰相反，新文化史从历史人类学发展出来，它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是有关现实的文化构建理论。彼得·伯克从文化在文化制品、文化实践和文化表征的表达、体现与象征中探讨文化流动导致的文化杂交现象。在他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是杂交的，而且杂交化过程伴随始终。这说明文化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每种文化流动的状态不同，表现也会不同，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具有杂交性。文化杂交之

后会出现某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会对新的文化碰撞或文化流动导致的新的文化混杂表现出抵制态度。文化流动受到时间、空间、社会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不同因素的参与与干扰都会导致不同的文化状态。

一是从文化力量对比上看，一般分为势均力敌与力量悬殊两种情况。按照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轴心时代”观点，他认为世界史的轴心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等地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并形成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犹太先知，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在遥远的、相互隔绝的时代各自独立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文化体系。各个文明在轴心时期所生产、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都影响到今天。在人类的每一次新的飞跃之中，他们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

在前现代时期的世界，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力量对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的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耶稣会的来华传教士利玛窦要采取“文化适应政策”才得以立住脚跟。利玛窦身着儒生服饰是为了让自己更能走进中国知识分子圈层；他允许皈依基督的中国信徒祭拜祖先，他将此看做社会习俗，而非与信仰冲突的宗教形式；同样是海外传教，传教士们在墨西哥、秘鲁、巴西等地传教所采取的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会感受到明显的文化阻力，经过数千年的沉淀，中国已然形成非常稳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当两个旗鼓相当的文化体系相遇时，如果想要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中，必然要采取调适的措施才有可能融入当地文化。而在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和南美洲传教，两种文化的地位是不对等，文化主动权显然掌握在强势的传教士一方。

二是从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看，一般分为主动接受与被动抵制两种情况。日本是有主动接受异质文化传统的国家。自19世纪中期至今，日本人一直在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部分来补充自己，比如英国的议会制度、德国的高校体制和军队制度、美国的物质文化等等。日本人对异质文化的

接纳态度早在8世纪就开始了,日本学习中国的汉字,就连日本天皇制政府形态也是借鉴中国的。日本历史上也有因闭关锁国导致的文化隔绝的状态,如在17世纪将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传教士驱逐出境,以阻止基督教在日本的快速发展,17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的锁国政策,使日本文化成了“高墙内的世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生产领域出现很多全球性产品,如可口可乐、麦当劳等。这些产品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同质化和异质文化抵抗两种情况,但这两种情况并非泾渭分明,更多时候是交相辉映、同时存在。如在中国,可口可乐一方面占据大量市场份额刺激了本土碳酸饮料纷纷崛起分化消费市场,以抵制外国品牌在中国独占鳌头的局面;另一方面可口可乐也被本土化,中国的消费者会用可乐煮姜丝当做预防治疗感冒的药饮。同样典型的例子是麦当劳,原本汉堡包生产的标准化是麦当劳的特点,但是麦当劳还是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和文化特点制定不同的配餐标准,如在乌拉圭出售荷包蛋汉堡包,在墨西哥出售墨西哥卷汉堡包,在印度出售用羊肉代替牛肉的汉堡包。在麦当劳刚刚进入日本、韩国、中国时,一般消费者会认为麦当劳的价格高,但仍然愿意消费。针对这一现象,五位美国人类学家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消费者而言,麦当劳提供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实例和标志,吸引顾客的不只是干净规范的就餐环境和食物本身。

彼得·伯克总结文化变迁过程认为,“文化的历史总体而言可以被看成是两股力量之间的斗争。有时,这一种趋势占优势;有时,那一种趋势又占了上风。从长远角度来看,两种趋势之间会维持一种平衡”。^[7]

三是从文化碰撞发生的区域上看,一般分为文化“接触区”和文化“贸易区”。文化之间的碰撞,必然发生于某个空间之中。通常来讲,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和事物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和事物的碰撞,先接触的地区往往表现得更为激烈,这些与异质文化接触的前沿区域称为文化“接触区”;当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找到共同点,能够彼此进行文化交流,且仍然能够保持固有文

化的主张和态度,这样的区域称为文化“贸易区”。^[8]两种文化的边界地区是易于发生文化碰撞的场所,如东欧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交接处是文化边疆,这种文化碰撞会滋生出共有文化,但这些共有文化又显然不同于彼此对立的中心城市文化。信奉基督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地区有着共同的史诗和民谣传统,同一个民谣故事中,哈布斯堡王朝流传的是基督教信徒凯旋而归,在奥斯曼帝国流传的是基督教信徒败北而逃。港口城市一般被视为文化边界地区,如15世纪的威尼斯,16世纪的里斯本和塞尔维亚,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7和18世纪的长崎与广州,这些城市都曾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大都市或中心城市则更倾向于扮演文化“贸易区”的角色。这一点在移民身上表现得更显著。如今天的伦敦、巴黎、纽约、洛杉矶都有很多移民,起初这些移民都在自己族群的社区内工作生活,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以保持原初文化身份,但这种状况随着物质文化和社会实践等各个领域文化交流的深入,移民群体仍然会被当地的城市文化同化,与此同时,移民群体也会为这种文化混合增添新的成分。

三、文化流动的可能性结果

彼得·伯克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里,文化的流动、碰撞的结果几乎可以排除文化隔绝这一状态,“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孤岛。文化孤岛的时代早已逝去。多少个世纪以来,有人为了保卫文化的隔绝性而维持所谓的文化‘隔绝’,这已经越来越难了”。^[9]从短时段来看,文化隔绝的状态有可能保持,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前景大致有四种可能性可供讨论:一是文化同质化;二是抵制或反全球化;三是双文化化;四是克里奥尔化。

第一种可能性:文化同质化。有人预测这种情况来临的时间会是2050年或是2100年,甚至更晚。这种预感是源于对全球化产品夹带着生产国文化内涵在全球流通的恐惧,文化同质化的结果必然是本土文化意识的丧失,带有同质化性质的全球文化似乎在各国都有一些迹象。如电影行

业的好莱坞电影，他们将自己的受众群体锁定为全球市场，所以我们今天在院线看到的很多电影都是跨国合作的作品，全球观影受众口味的趋同似乎也可以看做是文化同质化的佐证。彼得·伯克也拿自己的著作举了例子，他的亲身感受是，自己的一系列研究可能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所以他在形成书稿时潜在地将全世界的读者都纳入思考范围，他会揣摩某一种说法或典故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是否清晰。在这个过程中，彼得·伯克似乎将自己重构为一个世界公民。他非常肯定的是，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绝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甚至是众多。如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访谈中就曾表示，他是为全世界公众创作。

第二种可能性：抵制或反全球化。为了保卫本土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入侵，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17世纪中期的德国为了遏制语法规则的入侵，德国人对关于良好行为的词汇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抨击。例如文明（civilisation）一词在18世纪中期的法国出现，就其现代含义，表示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即与原始的野蛮人或蛮族相对立的就是开化的人。文明一词很快传遍欧洲，包括德国，然而文明一词在德国却没有得到与它原意相对应的意义。如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和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说，“文明”不过是大量的实用性技术知识、一系列应对自然的方式而已。但德国人却给文化（Kultur）一词以某种优越性，认为文化是一套规范性的原则、价值和理想。^[10]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抵制，19世纪中期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是只接纳西方的技术、器物层面的内容，而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

第三种可能性：双文化化。彼得·伯克将参与世界文化、但同时保留本土文化的情况称为“文化的复语现象”，即人们生活在双文化的（bicultural）环境下，过着双重生活。彼得·伯克列举了日本和巴西人在19世纪的生活状态。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一些上层阶级开始过着融西方与日本传统于一体的生活方式，如他们根据不

同场合吃西式日式两种不同的食物；在不同场合穿着不同的服饰，在家穿和服，在办公场所穿西服；居住的房屋也会出现西式的装修风格。19世纪的巴西人也是如此，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去上班，回家则换上传统的亚麻上衣。显然，这两个例子都说明，过着双重生活的人在公共领域的活动都遵从主流文化，而闲暇下来属于私人空间的部分则回归到他们的传统文化之中。彼得·伯克将这种情况看做是有意识的文化隔绝的温和版本，他认为，这种双重生活今天也一样在发生，他们在不同文化之间自由切换，选择他们认为对当下情境较为适合的文化状态之相融入。“现在，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人人都是移民，这一论断值得我们严肃对待。”^[11]

第四种可能性：克里奥尔化。彼得·伯克借用语言学术语“克里奥尔化”来形容文化杂交的复杂结构。克里奥尔是指生于美洲而祖先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白种人，他们使用的词汇主要是法语，但却使用非洲语言的句法，经过数个世纪的演变，变成独立的克里奥尔语。瑞典人类学家乌尔夫·汉纳兹（Ulf Hannerz）对这个文化现象做了这样的描述：当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后，某些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有着连贯程度，能以新的方式将各种事物汇合在一起，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河流的交汇处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这种文化汇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旧的文化形式中汇合催生出新的文化形式的过程。^[12] 例如，不同的非洲文化在巴西与土著和葡萄牙的传统融合混杂，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秩序。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史学的几个基本态度：一是文化始终处在流动的状态。彼得·伯克虽然没有刻意强调文化流动，但他在阐释文化间复杂的交互过程的基本前提是文化始终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流动，他认为上述种种文化杂交现象不是一次碰撞的结果，而是多次碰撞，文化间不断的交流不仅提供了文化滋养的源泉，又极大地创造出新的文化元素。二是文化是一种有意识的建构。有意识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指人们不断给“文化”以新的内涵，“文化史现在已经

包含着支撑日常生活的各种观念的历史”。^[13]也就是说,“以往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也就是被当作明显的、正常的或‘常识’的东西,现在却被看成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因为社会不同而有差异的某些东西,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改变的某种东西,是从社会的角度‘建构’起来因而需要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加以解释或诠释的某种东西”。^[14]文化建构依赖于人的实践和人创造的物质基础,文化的建构处于不断的变动过程,不断有新的内容充实进来,同时也会有过时的内容被淘汰掉,一旦形成某种稳定性的文化,便具有传承性。三是文化多元共存。彼得·伯克反对欧洲中心论,强调“中心化”,他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有赖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出现的古典复兴,在中国也同样发生过大规模的文化复兴,任何文化体系都是在不断地发展与演化的。新文化史学更加强调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同一文化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共存关系,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这对文化体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他们不仅同时存在,而且为彼此提供某些有价值的文化滋养。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文化转型的进程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它所肩负的使命必然也包含着现代化文化转型上的积极探索。从历史文化遗产上来讲,深圳无法与北京、西安、南京等历史文化名城相匹敌,也正是因为缺少厚重的文化底蕴,没有历史的羁绊,也使得深圳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积极的态度高于被动态度,调适性和包容性也更强。从深圳的地理区位来讲,毗邻香港,改革开放初期借助香港国际都市的优势资源吸引外资,向世界拓展;扼守珠江入海口,拥有蛇口、赤湾、妈湾等众多港口,通过港口贸易与世界往来;同时又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引擎城市,是连接周边地区与内陆城市的重要一环,统摄这些区位条件和40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渠道优势,深圳与世界的交往比内陆城市更加频繁,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既是文化“接触区”,同时也是文化“贸易区”。当前,深圳正在全力打造全球标杆城市,我们有必要认清当下深圳文化现状和特点,利用

已有的文化条件,有意识地建设与深圳未来发展相适应的城市文化。

参考文献:

- [1]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6.
- [2] [英]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56.
- [3] [英]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 [4] 杨豫, 等. 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教授彼得·伯克座谈侧记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0, (1).
- [5] [英]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社会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2-3.
- [6] 顾乃忠. 文化流动的规律性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3, (5).
- [7][8][9][11][12] 彼得·伯克. 文化杂交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50, 67-68, 93, 101, 58.
- [10]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文明史 [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 “文明释义”部分.
- [13][14] 彼得·伯克.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1, 11-12.

作者: 周笑冰,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王炎麒,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

责任编辑: 钟晓媚

深圳老年教育发展现状及完善对策

钟志红 吴晓辉 唐伟志

摘要：科学有效地开展老年教育工作，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立足时代呼唤，用 ERG 理论解读老年人的具体教育需求；立足深圳老年教育现状，分析深圳老年教育的问题。从坚持政治引领、明确办学定位、创新管理机制、提升办学水平、推动老年教育立法保障等方面完善深圳老年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深圳；老年教育；教育需求；政治引领

中图分类号：G7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2）03-0106-05

习近平总书记就积极老龄观提出了“三个积极看待”“三个有”和“三自教育”，即积极看待老龄社会、老年人和老年人生活，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对老年人进行自尊、自立、自强的自爱意识教育。上述论述充满了积极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思想，科学指导着老年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办学目标。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离不开老年教育，积极开展老年教育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有力抓手和必经之路。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吴玉韶介绍，预计到 2050 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 4.87 亿，占总人口的 34.9%，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我们党高度重视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六中全会强

调加强党对老龄工作的领导。从国家战略层面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深圳老年教育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深圳的老龄人口持续增长，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扩大老年教育办学规模，精心打造老年教育教学品牌，持续推动老年教育发展，办学成果显著。

“十三五”发展期间，深圳的老年教育扎实推进，办学理念不断提升，融入“文化养老、学习是最好的养老”等理念，逐步形成老年大学系统引领老年教育的发展理念；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学的老年学员超过 10 万人^[1]；办学模式不断创新，引入联动合作共建模式，管理更加规范；教学资